

分类号:

UDC

密级:

编号: 04110066

中山大學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通用字声母研究

学位申请人: 胡海琼

导师姓名及职称: 麦耘 教授

专业名称: 汉语言文字学

二〇〇七年 六月 十一日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通用字声母研究

专 业：汉语言文字学(汉语史)

博士生：胡海琼

指导教师：麦 耘 教授

摘 要

本文全面整理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至(五)册通假字、谐声字、异文以及异体字等材料；逐字标注古音信息，并且把这些材料制作成电子数据库，在此基础上进行穷尽性统计分析，对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进行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通过考察与来母字相关的材料，可以看出来母不仅大量自身相通，而且还可以与唇、舌、齿、牙喉音相通，这些相通的字多涉及二等和重组三等，据此，我们认为来母在上古汉语辅音系统中可能既是一个独立的声母，又可以充当二等和重组三等的介音。同样，通过考察与以母字相关的材料，可以看出以母在上古辅音系统中与来母平行，我们认为以母在上古可能既是一个独立的声母，又可以充当三等的介音。

2 通过考察与鼻音相关的材料，我们认为上古汉语中可能存在两套鼻音：一套是普通鼻音 $^*m-$ 、 $^*n-$ 、 $^*\eta-$ ，一套是清鼻音 $^*m̥$ 、 $^*q̥$ 、 $^*\etḁ$ 。鼻音与同部位爆发音相通的材料说明当时可能存在鼻冠爆音 $^*mb-$ 、 $^*nd-$ 、 $^*g-$ ，这套鼻冠爆音可能是浊爆音或鼻音的音位变体。

3 通过考察与唇音相关的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的唇音只有一套，轻重唇混用，与“古无轻唇音”的规律相符。此外，上博简中还有唇音与齿音龈音（即端组及精组）的交替、唇音与软腭音（即见组）交替，即： $^*pj->t-$ ； $^*k^w->p-$ 。我们认为因为听觉误差产生的混淆是这两种语音交替现象产生的

原因之一。

4 楚简中有部分精组三等字与见组字之间的交替现象，我们认为可能是擦化规律作用下“精组见组合流”这一演变规律的开端，从词汇扩散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两组字从上古的偶然接触到近代全部合流的整个过程。此外，我们认为上古部分端组与见组的交替、章组与见组的交替与这里说的精组与见组的交替是同类现象，可以用擦化规律来统一解释，并非一定要构拟复辅音来解释。

5 从整个声母系统看，上博简的声母系统与《诗经》音系大致相同，没有反映出明显的楚地方音特色，可能当时雅言系统已经成熟，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在各地基本一致。

关键词：上古音，辅音系统，语音对应，上博简

A study on initial constant of interchangeable characters
in the “Bamboo Slip Documents of Chu in Warring
States period Kept in Shanghai Museum”

Major: Chinese Philology

Name: Hu Haiqiong

Supervisor: Prof. Mai Yun

Abstract

This paper Coordinated all *tong jia zi*、*xie sheng zi*、*yi wen* and *yi ti zi* in “Bamboo Slip Documents of Chu in Warring States period Kept in Shanghai Museum”, from volume 1st to volume 5th. Then, I make a data-base with the material which contains phonetic message. On this foundation, I did statistical analyse, researched consonant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and got some conclusions:

1. By research the material of *tong jia* and *xie sheng* between the *lai mu zi* and other characters, I think *lai mu* is independent in the Ancient Initial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be use to connect the Initials and Finals in the 2nd *deng* and *chong niu* 3rd *deng*. In the same way, by research the material of *tong jia* and *xie sheng* between the *yi mu zi* and other

characters, I think *yi mu* is independent in the Ancient Initial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be used to connect the Initials and Finals in the 3rd *deng*.

2. By research the material of nasal, I think maybe there were two sets of nasal in the Ancient Chinese: one is ordinary nasal *m-, *n-, *ŋ-, another is devoiced nasal m̥-, n̥-, ŋ̥-. The material of replacing each other between nasal and plosive which use the same place of articulation showed that maybe there was a nasality plosive *mb-, *nd-, *ng-, and maybe it was an allophone of voiced plosive or nasal..

3. By research the material of labial, I think there was one set of labial in the Ancient Chinese, *qing chun* and *zhong chun* were used in the same way. It accords with the law of “disappearance of lip constant in remote ages”. Besides, in the “Bamboo Slip Documents of Chu in Warring States period Kept in Shanghai Museum”, there are replacements between labial and dental, alveolar (*duan zu* and *jing zu*), between labial and velar (*jian zu*), as *pj->t; *kʷ->p-.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is the confusion owing to auditory error.

4. In the Bamboo Slips from Chu, there are replacements between *jing zu* 3rd *deng zi* and *jian zu zi*. I think maybe it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law “*jing zu* and *jian zu* confluenc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lexical spreading, it showed the process that they contacted by chance in ancient, and unified in latter-day. Besides, I think, in the Ancient Chinese, the replacement between *duan zu* and *jian zu*, is parallel to the replacement between *zhang zu* and *jian zu*. This phenomenon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law of spirantization, besides reconstruction of Consonant Clusters.

5 The Initial system of “Bamboo Slip Documents of Chu in Warring States period Kept in Shanghai Museum” is the same to “the Book of Songs” in the rough, didn’t reflect characteristic of Chu dialect. Maybe *ya yan* system was mature at that time, the sound system of literary language everywhere are in according with it.

Keywords: Old Chinese phonology, The Initial system, phonetic mutation, Bamboo Slip Documents of Chu in Warring States period Kept in Shanghai Museum

凡 例

1 本文所说的“通用字”指的是古代书面文献里代表同一个词、具有共存换用关系的字。通用字应该是同音的。本文所说的“相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相通假”，表示是通用关系。

2 本文行文一般用简体字，涉及到本文讨论的通用字时，一般用繁体。

3 本文引用的出土文献材料，一般采用宽式隶定，涉及本文讨论内容的，原文献用字和通行字同时写出，不涉及本文讨论内容的，一般直接写出通行字。如在讨论“𢇛”与“猛”相通时，我们引用出土文献材料格式为：“𢇛（猛）則亡親，罰則民逃。（《从政》8）。”

4 文中给通用字标注的声母信息一般是中古音，附录3对“上博用字”和“文献用字”（表示上博简之外的其他文献的用字）标注的声母信息也都是中古音。

5 我们原来使用的国际音标术语与国际语音学术语脱轨、不对应，而且，有些术语所指不明确，使用不方便，所以，有学者倡导使用新的国际音标术语。本文使用的新术语名称主要参考2007年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制定的国际音标术语。一般在括号中注出对应的音韵学术语。

6 本文所用的全称、简称对照表：

全称	简称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上博简
郭店楚墓竹简	郭店简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书	马王堆汉墓帛书

目 录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I
凡 例	VI
目 录	VII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来母与-r介音	32
第三章 以母与三等介音	47
第四章 鼻 音	60
第五章 唇 音	78
第六章 端组与精组	95
第七章 结 语	102
参考文献	104
附录 1: 上博简字词考辨两则	126
附录 2: 上博简通用字声母几率统计表	133
附录 3: 上博简通用字简表	135
后 记	i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下文简称“上博简”)共一千二百余支简,三万五千余字^①,数量惊人,内容丰富,自2001年11月首批材料公布起,就在学术界引起高度关注。现已出版五册,共28篇^②,16000字左右。我们选取这批材料进行上古音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一、新材料的整理和研究是学术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王国维先生曾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③后来陈寅恪先生进一步阐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④上博简正是当今重要的新材料之一,其内容一部分可以与传世文献相印证,一部分是传世文献所没有的,其中大量的通假、异文、谐声字、异体字以及部分韵文,负载了丰富的语音信息,是我们研究上古音的重要材料。而且,它长期掩埋在地下未经流传改易,真实地保留着当时的面貌,具有极强的文献真实性,属于太田辰夫所说的“同时资料”或“准同时资料”^⑤,此外,它还有相对明确的时代和地域,这些都为深入研究上古音提供了便利条件。

朱德熙先生曾指出:“帛书对于历史音韵学的研究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帛书很多地方是押韵的,又有大量的假借字,还有许多和现存古书不同的异文。这些都是研究古音韵的重要资料。”^⑥对古音研究来说,这些出土文献材料非常珍贵,但也纷繁芜杂,有些材料能为古音研究提供线索,有些材料对古音研究毫无用处,甚至还会干扰我们的视线,这就需要

^①《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朱渊清,廖明春《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4页。

^②学者们对分篇有不同意见,本文暂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五)册原本篇目统计。

^③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

^④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第1本2分册。

^⑤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⑥朱德熙《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座谈会上的发言》,《文物》1974(9)。

研究者进行清理,甄别出对古音研究有价值的材料。对照传世典籍和其他出土文献,从音韵的角度全面梳理上博简释文,对其中的通假、异文、谐声、韵脚字、异体字等的材料详细考察,尽可能全面地清理出可信可靠的对上古音研究有价值的材料,这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准备尽力整理出较为可信的通假字表、异文表、谐声表等,并制作成电子数据库,既方便自己的研究,也方便以后的研究者利用这些资料继续深入研究。

系统整理这批材料中的语音信息,对上古音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可以为上古音研究提供新的、可供参考的素材;另一方面可以用确实可靠的材料验证我们以往的结论,还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发现一些问题,从而把上古音研究推向深入。

二、上古音研究与古文字相结合有助于扩大研究的视野。

上古音研究与古文字相结合,充分利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对上古音研究还是对古文字研究,都有重要作用。李方桂先生曾说“古韵学的出路在于古文字。”^①朱德熙先生也有同样的看法,他曾指出:“研究上古音,除了汉藏语比较的资料以外,汉语文献资料并没有用完,古文字就是一大资源。我总希望研究上古音的人能注意一下古文字。……我希望上古音研究能够跟古文字研究结合起来。”^②李新魁先生在展望上古音研究前景时指出:“必须充分利用古文字研究的成果,把对古文字的研究和古音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古文字(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文字)所提供的材料和所展示的问题,运用到古音的研究上来,特别是谐声系统和假借字系列必须进行新的、更深入的研究,找出确切的、较为完整的体系,为古音的研究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佐证。”^③刘钊先生则从古音学对古文字研究的重要性这个角度谈到二者结合的必要性,他说:“以科学的文字符号观来认识文字,始终以符号的眼光来看待文字,重视声音在文字孳生与分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正确考释文字的关键。汉字在发展演变中,其许多形体上的变化是受语言的影响而以声音为枢纽的,一个形体可以分

^① 本文转引自曾宪通《从“𠂔”符之音读再论古韵部东冬的分合》,载香港中文大学《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第75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

^② 朱德熙《上古音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语言学论丛》(第14辑),商务印书馆,1984,第19-20页。

^③ 李新魁《汉语音韵学研究概况及展望》,《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第11页。

化出一个或几个形体，这种分化有时只有音的联系而无义的联系，只有正确地认识这种分化，才能对文字形体的发展演变取得科学的结论。”^①

上古音研究与古文字相结合还可以给研究者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有助于解决一些单靠音韵学难以解决的问题。裘锡圭先生很早就从“古文字对研究谐声的重要性”和古文字数据“为一些古音现象提供重要的例证”这两个方面具体阐释了古文字资料对古音研究的重要性。^②自从段玉裁提出“同声必同部”以来，谐声一直是研究上古音的一项重要材料。谐声字所表现出来的系统大体与《诗经》押韵系统相合，二者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有一些不合规律的情况，比如，依据谐声偏旁所归的韵部与《诗经》韵部不一致该怎么处理？除了常说的时代、地域差异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对谐声及其声符的判定是否有误。一般利用和研究谐声都依据《说文解字》，但是《说文》所依据的小篆字形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最初的原始文字的情况，从商周到汉代经历了一两千年的发展，字形演变，难免出现讹误。假如许慎把非谐声字说成谐声，而又刚好牵涉到韵部的不同；或者依小篆字形判定的声符，与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形不合，那么，根据《说文》得出的结论就会与上古的实际情况不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古文字的知识，结合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订正《说文》的错误，还原真实的谐声材料，才能避免伪材料带来的麻烦和错误。在遇到谐声与《诗》韵相冲突的情况下，积极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试探求解，可能会柳暗花明，消除一些疑惑。结合《诗》韵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有望得出一份精确的谐声表。

另外，古文字字形多变，异体字众多，其中不乏变换声符的异体字，这些材料对于上古音研究来说也是很宝贵的，虽然它的数量不如谐声字多，但是，它提供的语音信息是相对明确的，易于把握的。

三、对出土文献的文本释读有参考价值。

出土文献的文本释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但难度也非常大，单靠古文字学本身可能很难完全做好，其中大量的通假、异文以及异体字等材料的处理，就需要音韵学的参与。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② 裘锡圭《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中国语文》1979（6）。

由于古音通转标准宽严不一，通转方向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致于在许多人的眼里古音是“无所不通，无所不转”的，所以，谨慎的学者不到万不得已不用通假，而有的学者却随意通假，这两种都不是应用音韵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正确态度。随着出土楚系文献的不断增多，我们对其通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李零先生：“在郭店楚简和其他楚简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的很多通假字都并不是凭音同音近就可以任意选择，而是要由楚地当时的书写习惯来限定范围和加以具体指认。它们的写法有些不太固定，可以有两三种选择。有些则相当固定，几乎处处都是同一种用法。这里面就有习惯在发生作用。”^① 所以，如果我们系统地整理一批材料就会大致看出哪些字与哪些字是经常相通的，在具体的语境中哪些字习惯与哪些字通假，这些带有规律性的通假文例能帮助我们判定通假。这种有相同语境的文例作证而得出的结论，可靠性就会大大高于单凭音理的推测。

音韵学知识能为出土文献的文本释读提供一些思路和线索，除了常见的利用古音通转训释字词以通文意之外，还可以利用押韵规律分析句读，为简文的编联提供语音形式上的线索等。

综上所述，我们选取这个课题主要有两大方面的意义：从上古音本身的研究来看，利用上博简的通假、异文、谐声、异体字等材料整理音系，可以佐证成说，补充旧说，也可以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对上古音的深入研究有帮助；从上古音的应用角度看，通过古音通转释读文本、通过用韵规律为句读和编联提供线索等，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体现音韵学的功用，而且，我们还可以总结出利用音韵学知识释出土古文献的方法和原则，整理出一套较可靠、可操作性强的音韵通转条例，以方便非音韵学专业的人利用音韵学这个武器。

^① 李零《郭店楚简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美国达慕思学院郭店楚简〈老子〉国际学术讨论会感想》，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47-52页，又，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85-194页。

第二节 研究现状

一、上古音研究概况

上古音研究的总体情况,郑张尚芳先生作过一系列的总结,他在《上古音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①和《上古音研究的新近动态》^②详细评介了上古音研究在声母、韵母及声调、音节类型、语音变化的形态意义等几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冯蒸先生^③、马重奇先生^④等在回顾音韵研究的总成绩时也涉及到对上古音研究状况的述评。他们对上古音研究的成果已经作了全面的清理,本文不再重复。我们准备从上古音研究的材料、方法、理论三大方面进行概要述评。

从材料看,汉语上古音研究除了利用古韵文,谐声字,通假字,异文,譬况,读若,声训,直音,古拟声词,异读,同族词异体字等传统文献材料之外,近几十年来对梵汉对音、民族语言、现代方言与域外方音等材料的发掘和利用越来越多。其中,民族语言、现代方言等活的语言材料和新近出土古文字材料的研究特别引人注目。

从方法看,除了继续使用传统音韵学的方法,如系联法、归纳法等考订清儒韵部、声纽分合,给以补充或修正,学者们开始接受现代科学思想的影响,研究方法越来越精密,历史比较法、历史层次分析法、内部拟测法、译音对勘法等都有广泛应用,除此之外,还引入了试验语音学的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等,这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语言研究,必将推动语言研究向精密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还有很多操作性的方法,耿振生先生^⑤、麦耘师^⑥对此有详细论述,我们就不重复了。

从理论看,一部分学者继承清儒朴学的传统,继续考订韵部、声纽的分合,对前人的研究给以补充或修正;还有一部分学者用历史语言学的方

^① 郑张尚芳《上古音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一)(二),《古汉语研究》1998(4),1999(1)。

^② 郑张尚芳《上古音研究的新近动态》,《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4)。

^③ 冯蒸《中国大陆近三年(1996—1998)汉语音韵研究述评》,《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9(1)。

^④ 马重奇《1998-2003年汉语音韵研究综述》,《福建论坛》2004(11), (12)。

^⑤ 耿振生《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⑥ 麦耘《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的一些方法问题》,《汉语史学报》(第5期),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第148-158页。

法、从汉语语音史的角度研究上古语音系统，分析其结构变化，变化的语法功能及语音演变规则，演变的发生机制及其在后世音韵、方言中的反映，取得了很大成绩。雅各布森提倡的类型学，拉波夫开创的社会语言学，奥哈拉提倡的实验音系学，陆志韦开创的音韵材料的数学处理，以及接触语言学和迪克森提出的聚变裂变理论等引入汉语古音研究，都有很多新发现、新成果。

二、利用出土简帛文献研究上古音述评

近百年来出土的简帛多数是战国到秦汉时期的，所以，学者们利用这些材料进行音韵研究时主要是针对上古音的问题进行探讨，有对战国秦汉的语音系统进行探讨的，也有对上古某一声纽或韵部进行考订的，有从上古雅音角度进行研究的，也有从上古方音角度进行研究的。我们分两部分对这些成果进行概述：

（1）对上古音系的研究

以前研究上古音系主要利用《诗经》的押韵材料、谐声材料以及传世古籍的通假、异文、韵文、注音材料等，把时间跨越几百年甚至近千年、地域跨越南北大地的材料放到同一个平面上进行研究，把这些不同的材料当作同质材料处理，由此归纳出上古语音系统。但是，随着音韵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这种不分时代、不分地域得出的“粗放型”上古音系不满意，于是，有学者尝试利用单一材料来研究上古某一个时期的音系，如利用出土简帛帛书对秦汉雅音系统进行研究，主要有李玉先生和李存智先生；对古方音音系进行研究的主要有汪启明先生、刘宝俊先生和赵彤先生。

李玉先生的《秦汉简帛书音韵研究》^①主要利用建国后出土的简帛文书，兼采建国前的居延汉简等，从中搜集了 6800 余对有音韵研究价值的通假、异文材料，运用以几率统计为主的统计法，结合历史比较法、内部构拟法和类型学拟测法，对秦汉时期的语音系统作了比较全面细致的研究。他总结出 22 个单辅音声母的大致格局，并为清鼻音、清边音以及 CL 型、ST 型复辅音声母的可能存在提供了丰富的例证。在韵母方面，提出 31 韵部说，还指出祭、月两部只是偶尔相通，歌部也不跟祭、月相通，这

^① 李玉《秦汉简帛书音韵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对认识歌、祭、月三部的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他还根据统计证明秦汉时期鱼、侯两部应该分立，与一般认为的“汉代鱼、侯合并说”不同。在声调方面，他主要依据几率统计证明当时四声分立。

李玉先生的研究除了用传统的归纳声类和韵部的方法外，还用了数学的方法，穷尽性的统计分析，在定量的基础上作定性研究，使得结论有理有据。他除了利用出土文献材料外，还引入了方言和民族语言等活的语言材料作论据，材料丰富，结论可信。

台湾李存智先生的博士论文《秦汉简牍帛书之音韵学研究》对秦汉音系也有系统的研究^①。

汉语从有文献可考的历史以来就一直有关于方言的记载，如《孟子·万章上》：“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而且，《尔雅》、《说文》、《方言》等明确记载了不同方言区之间的差异。传世文献经过历代传抄校勘不易也不宜进行上古方言的探索，随着具有明确时代和明确地域的出土文献的面世，古方言的研究逐步展开，以齐鲁方言为代表的北方方言和以楚方言为代表的南方方言研究成果较丰。

最早对上古齐语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汪启明先生，他的《先秦两汉齐语研究》^②一书，以传世文献与出土的齐地金文、齐地战国秦汉简帛材料相结合，探讨了上古齐地方言问题。此书的第三、第四章“齐音钩沉（上下）”报告了古齐语与当时《诗经》音在声类和韵部上的十项差异，如：从唇音和齿音与来母的密切关系出发论证了古齐语中有复辅音的遗迹，齐语还有送气鼻音声母（即清鼻音），还存在舌根音与舌擦音的交替；之支脂微四部关系密切，真元文三部可能从战国时代就开始相混，舌尖鼻音韵尾和舌根鼻音韵尾之间有交替现象，歌元对转等具有方言特色的语音现象。这部著作搜集的材料丰富翔实，立论严谨，没有因为某些声类或韵部有相互通用的情况就简单地将它们归为一类，这是值得提倡的。

出土简帛中楚地文献材料异常丰富，从战国到秦汉时期的材料都很多，所以，有条件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其中以刘宝俊先生对秦汉楚音系的

^① 李存智《秦汉简牍帛书之音韵学研究》，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5。

^② 汪启明《先秦两汉齐语研究》，巴蜀书社，1998。

研究、赵彤先生对战国楚音系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

刘宝俊先生的《秦汉帛书音系概述》^①一文，以马王堆汉墓帛书为研究对象，归纳出一千三百多对通假、异文，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秦汉时期帛书音系，他认为这是当时楚地方言音系，有 30 韵部，26 个单辅音声母和 19 个复辅音声母，复辅音声母正处于一个逐渐消失衰亡的过程。

赵彤先生的博士论文《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②利用传世文献——《楚辞》、宋玉赋和《庄子》的用韵，还有出土战国楚系简帛文献——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第二册的谐声和通假，运用系联法、音系参照法、数理统计法等对声类和韵部进行分类，运用“内部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对战国楚方音的音值进行构拟。他归纳出的战国楚方音系统：26 个声母，其中包括一套清鼻音、清流音（共 5 个）：有‘-j-、-r-、-i-、-u-四个介音，还可以组成‘-ju-、-iu-、-rju-等复合介音；30 韵部，193 个韵母；平、上、去、长入、短入五个声调。他还找出了楚方音与《诗经》音相比在声、韵、调三方面的不同特点及其特殊的演变方式，如声母方面，他指出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kl-演变为中古汉语的舌尖音和舌面音，“在战国楚方言中‘kl-失去后置辅音-l-变为单辅音‘k-”等；韵部方面，“部分脂部字转入微部，部分真部字转入文部”等，声调方面，“除月部以外各部的长入字在战国楚方言中变为去声”等。

（2）对上古声类或韵部的研究

谐声和《诗经》等韵文的押韵材料主要是用来研究上古韵部的，上古声类的研究一直以来材料都不理想，出土文献中丰富的通假和异文为上古声类的研究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有很多学者利用简帛文献对上古雅音的声类或韵部进行考订，如钱玄先生^③、周祖谟先生^④、田明先生^⑤、罗福颐先生^⑥、赵诚先生^⑦、张儒先生^⑧、胡平生先生^⑨、王建慧先生^⑩、吴九龙先生^⑪、

^① 刘宝俊《秦汉帛书音系概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1）。

^② 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2003，又，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③ 钱玄《秦汉帛书简牍中的通借字》，《南京师院学报》1980（3）。

^④ 周祖谟《汉代竹书与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

^⑤ 田明《秦汉竹简帛书的异文别字及其语音系统》，《古汉语研究论文集（二）》，北京出版社，1984。

^⑥ 罗福颐《临沂汉简通假字表》，《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中华书局，1986。

时建国先生^①、李玉先生^②、陈伟武先生^③、沈文倬先生^④、吴辛丑先生^⑤等，我们择要介绍如下。

周祖谟先生的《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一文利用临沂汉简的《孙子兵法》、《尉繚子》和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周易》、《老子》甲乙本、《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 7 种文献，以有传本可对校的通假字为主，考订了上古韵部之间的关系，并详细研究了上古声母，如舌头音端组、知组与舌上音章组（照系三等）三组塞音声母为一组，尚未分化。齿头音精组与庄组（照系二等）不分等。这些与原来从传世文献中得来的研究结论相符，用新的材料进一步证明钱大昕等人的结论的正确性。正如周先生所总结的“有些足以印证清人和近人关于古音声韵部类的成说，有些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再做进一步的探讨。”^⑥

赵诚先生对临沂汉简的 300 多组通假字进行了研究，发现这批竹简的通假字阴声韵与入声韵关系密切；平入的区分即将完成，上声的产生已到了相当阶段但还没有完全分出，去声则好像根本没有分出来；声母除了证明前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等公认的观点外，还发现了一些可能是方言特征的现象，如非母三等字与晓母三等字相通，和现代江西、湖南等地的某些读法相近，这大概是当时齐语的特点。赵先生在对古文字材料的通假研究时遵循的原则是“为了避免产生可能发生的意外，为了便于别人利用这一批材料，也为了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作综合研究，这一类文章最好以摆情况、摆材料、摆问题为主，比较论述为辅。”^⑦他的这一原则对

^① 赵诚《临沂汉简的通假字》，《音韵学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6。

^② 张饴《关于竹书、帛书通假字的考察》，《山西大学学报》1988（2）。

^③ 胡平生《阜阳汉简〈诗经〉异文初探》，《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④ 王建慧《马王堆帛书〈周易〉异文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8（12）。

^⑤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中的古文、假借、俗省字》，《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

^⑥ 时建国《从临沂汉简、长沙帛书通假字再证古声十九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6）。

^⑦ 李玉《秦汉之际楚方言中的 ml-复辅音声母》，《语言研究》1991 年增刊。

《〈马王堆汉墓帛书〉通假字商兑》，《语言研究》1996 年增刊。

《〈银雀山汉墓竹简〉通假字商兑》，《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及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年。

^⑧ 陈伟武《银雀山汉简通假字辨议》，《古汉语研究》1997（3）。

^⑨ 沈文倬《礼汉简异文释》，《文史》第 33、34、35、36 辑，中华书局。

^⑩ 吴辛丑《简帛典籍异文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⑪ 周祖谟《汉代竹书与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 年。

^⑫ 赵诚《临沂汉简的通假字》，《音韵学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6 年。